

Witnessing as Text: A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I Lived*

Under the Enemy's Bayonets

See Hooi 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Book of Job* from the Bible, there is a line that reads: "I alone have escaped to tell you." In the essay "How I Lived Under the Enemy's Bayonets", the messenger who delivers the story reveals neither name nor origin, yet conveys a tale of resistance that becomes a *testimony* of memory, history, and its time. This is why the piece was included in *The Anthology of New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1971)* edited by Zhao Rong, and later in *A Reader in Malaysian Chinese Prose 1957–2007* edited by Chan Tah Wei and Chong Yee Voon (2007). "Before we can say where a story comes from, we must first ask what it is." This essay—structured around a rare account of a woman's experience during wartime—raises key questions: How is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narrated when framed through a female perspective? Where was the essay first published, and what ideological stance or intention does the author convey? Through whose reading and imagination did it help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History may be filtered through the needs of state power, and while literature often serves the function of restoring memory, it can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In such a dynamic, how can literature serve as testimony to history? Moreover, when women are passively drawn into war, is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articulation merely testimonial, or does it also serve as part of the grand narrative shaped by party and epoch?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erasure and forgetting*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women.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Testimony, Gender, MCP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见证”的文本：《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的 脉络化解读

施慧敏*

国立政治大学

内容摘要：

《圣经·约伯记》里有一句话：“我是惟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里，报信人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来历，却说了—个抗争的故事，成了记忆、历史和时代的“证言”。这是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71)散文集，陈大为和锺怡雯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2007)一书，皆收录此文之因。“在阐述故事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他是什么这个问题。”¹作为文学里难得一见的女性抗战经历和题材，抗日的事迹是如何被叙述的？文章发表于何处，作者表达了怎样的意识型态与意图，经由什么成员阅读与想象，凝聚共同体意识？历史可能依据政权需求筛选过去，文学作为修复记忆的功能，有时候也会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如此又如何以文证史？而女性被动地卷入战争，她的参与和表述，除了见证之外，是否也是时代和党派下的宏大叙事？本论文从失记的角度切入，探讨文本的再现机制，以及历史、文学、女性的可见与不可见。

关键词：

抗战、见证、性别、马共、历史

* 施慧敏，马来西亚人，国立政治大学中文博士，研究方向为文人心态研究以及现代散文。

¹ 普洛普：《故事型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

壹、前言

二战后，胡愈之²诸人筹办新南洋出版社，出版《风下周刊》之时，同时出版《新妇女》刊物，由他的夫人沈兹九主编。胡沈皆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在新马以无党派面目出现。早在1934年，沈兹九就在上海创刊了《妇女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号召妇女抗日救亡。1945年至1947年间，《新妇女》在新加坡刊行，编辑群和作者群皆以女性为主体，仅出版28期。创刊号上说明刊物是提拔女性写作的场所，并且强调马来亚的妇女运动是统一战线，《新妇女》要和前进姊妹们同行。封面也不讳避游击队女战士的形象，估计是马共领导的马来亚抗日有功，战后两年半期间属合法组织之故。内容上有关堕胎、避孕、性爱等妇女保健知识；也重视国际女权运动，如《苏联战时保护母女的法令》、《中国解放区妇女的生活》；以及国际杰出女性的访谈与报导。此外，此书也提供文艺创作空间，书写女性觉醒，革命色彩的抗日见闻与经历。虽然是有意识、有策略、注重阶级与党派的，社会主义女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但总的来说，它不是一本妇女的艺术杂志，而是具有学理性的女性主义刊物。此后，基于英方和马来右派实行坚壁清野的清剿政策，加上冷战的世界局势，社会主义著述在社会上消声匿迹。

惠斌的文章《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刊于《新妇女》第十期至二十一期（1946.12-1947.11）。据称是目前唯一仅见，以中文书写的女性马共散文。此文长达两万余字，叙述女性在霹雳州锡矿场和胶林从事秘密活动，和打游击战等抗日事迹。一九七零年，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71）散文集，收录了《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在导论中，他详细介绍了各别作者，唯独略过惠斌一人不提。篇末，仅对此文轻描淡写提了一句“内容充实，可作史实看”。³选集体现编者的文学观，赵戎一向主张文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先驱，倾向革命文学理论，尤其把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运动合为一体，视为思想文学的新启蒙运动，收录此文在情理之中。虽然编选颇有深意，但评价却避重就轻。“史实”一句的内涵后来被陈大为和锺怡雯接收下来，即使年代不符，《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2007）一书，仍特别收录《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让惠斌的身影重现于文学的选集。根据编者的说法，早期女性的创作偏低，惠斌纪录了抗日历程与内心细节，提供男性主流战争论述之外的另类声音。“女性的”，

² 胡愈之，1941年12月应聘来星主持南洋商报，1942年新加坡沦陷避难苏门答腊岛。战后返星办报，直至1948年3月经香港返回中国。

³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1971年），第12页。

“非官方的”的另一种纪录，是破例收入之因。⁴显而易见，编者肯定“女性”于文学场域中难得的在场，尤其以“纪实”来彰显战后消逝于公共领域，和历史书写中的马共抗日的贡献。换言之，经过了36年之后，《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的再次出现，是在典律化的过程中，做一个有限度的提醒——这个被遗忘的马共族群，也有向大众言说的机会；而陈锺的用意，在追认轶事之外，更是强调文学里难见的女性抗战经历和题材。

当一个国家集体失忆，纪实文学确实能够反映历史，如此才会有两个选本不约而同收录《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用以传递曾于某个时期中断的记忆。本文承接以上之用意，以时代背景和文本脉络，来试着回应两个问题：一、文学是挑战官方记述的力量，但若为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导，作品有无可能只是一个宏大叙述和策略性的修辞？叙事的“选择”会否让“见证”只是趋于模式化的历史，却让文学变得游离？二、惠斌的抗日纪录，究竟是以政治意志还是以女性主体作为叙事主轴？当战争与革命把女性推上社会的舞台，女人的故事，女作家的文字自然而然会被指认为女性发声的标签。这是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m)，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指派。实际上，这个文本在某种特殊目的下产生，又因某种目的出土，其中如何嵌入女性的感受、视角，和纯粹的“内在自我”(interior self)？因此，本文将此文“历史化”(historicize)，梳理二战前后的马华的文化和政治场域，参照同时代或同类型文本，并以傅柯《何谓作者？》一文中的基本论点，以及戴锦华指称女性为“空洞的能指”，来考察这篇抗战散文典律化的过程，所映射出“言与不言”背后的意义。

贰、失记与见证

马共一直是马来西亚的敏感词汇，⁵直至1989年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对抗，走出森林。长久以来被噤声的旧事，开始寻找发声的管道，“后记忆”的文学和纪录片才陆续浮出地表。早年赵戎以《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比拟

⁴ 钟怡雯陈大为编著：《序：流传》《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3》（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07年）。

⁵ 1786年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实施种族分化政策。1930年马共成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协助华工组织工会进行各种斗争。1942年日本侵略马来亚，马共建立人民抗日军，进行各种游击战，日本战败后英殖民重新占领马来亚，并颁布“特别紧急条例”镇压抗日人士。1955年华玲会谈破裂之后，遁入森林持续武装抗争，并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89年，马共、马来西亚政府以及泰国在泰国合艾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同时宣布解散并让马共成员定居在泰国南部及马来西亚，回归社会。

为马华文学血的历史；陈锺强调非官方的记忆，皆是让被屏蔽的过去“再现”于文本之中成为可征信的史实，有浓厚的“见证”意义。虽说历史书写过去，但同时朝向未来。异见的声音、血腥的往昔要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份，得视乎时代中的文本，如何与文本中的时代进行对话。当国家主义早已建构起一套右翼诠释与价值观，统治阶层未曾认可的元素，不会获准进入社会记忆成为文化遗产。马共“非官方的”叙事，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第一手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只是在主流的史册之外补充“真实故事”的努力。《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亦如是，它和《走上抗日的道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焰同志回忆录》以及《生命如河流——新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等，都是女性观点的抗日、抗英、抗马的经验。唯一的差别在于，它本身就是“此时此地”的见证物，而非漫长年月后幸存者的回顾。当它一再被收入文学选本，意味着编者有意以文学的记忆来填补官方的记述，可见后来者对于重要记忆的选择与呈现，是官方和民间叙事之间解释权的角力。

这篇长文写于二战结束后一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获各方肯定抗日贡献，并建立了新的组织——人民委员会，成为国内强大却短暂的政治力量。⁶后自 1948 年的“紧急状态”起，⁷继 1955 年华玲会谈失败，⁸到 1989 合艾和平协议，⁹马共在法律上一直是非法政党。虽然抗日功劳和武装革命，迫使英方和马来领袖同意与友族分享政权，间接促使马来亚实行族群联合共治。然而，马来西亚官方教科书对于 194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时期始终讳

⁶ 1942 年，日本侵占马来亚。三年零八个月期间，马共在英军的召集下，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展开游击战，成为马来半岛日据时期的抗日主力之一，并逐渐发展壮大。日军投降后，殖民政府颁授予马共总书记陈平 OBE 大英帝国勋章，曾短暂承认马共为合法组织。马共成立办事处，并在多个地区建立地方政权，控制了当地局势。后英军重返马来亚，双方关系日益紧张，英军于 1945 年 12 月，开始解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进而解散各地的人民委员会。

⁷ 1948 年 6 月宣布“紧急状态”，马共是非法组织。英军开始驱逐左翼领导人士，大批马共遭到逮捕，被迫再拿起武器而战，于 1949 年 2 月 1 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结束英军接手马来亚之际，马共在武装装备和缺乏马来社会支持的双重劣势下，已经错失解放马来亚的良机。

⁸ 1955 年，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首次普选出联邦自治政府，马共与自治政府代表在北马吉打州的华玲县举行了谈判，史称“华玲会谈”（Baling Talks）。马共要求政府承认其为合法的政治组织，若不，则豁免马共成员，放下武器后行动自由，可以参加任何现有政党，或组成新的政党。马来亚当局拒绝并坚持马共无条件投降，和谈最终因双方分歧太大而宣告破裂。马共退回马泰边境，继续跟马来亚政府对抗。

⁹ 1989 年 12 月 2 日，马来亚共产党、泰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合艾正式签署和平协议。马来亚共产党宣称自愿解除武装，走出森林；马泰两国政府同意这批约 1200 名原马共成员分别选在泰国或马来西亚定居，以平民的身份重新生活，融入社会。

莫如深。对于集体静默的社会现象，阎连科曾以“失记”一说，指出这是“对现实与历史有选择的抛去和留存”，因为：

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和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的管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艺术的表现和表演。¹⁰

李有成在《记忆政治》一书中以阎连科的“失记”说为例，进一步说明国家失记之因，在于统治阶级在历史事实前，有不堪闻问的一面。马共之所以消音，皆因当年武装抗日的是华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共产党，若据实详载，官方叙事既无从否定马共反殖反帝的历史事实，又必须确立马共在马来(西)亚历史进程中的定位，还得面对马来统治集团的先人从中获利的尴尬，于是缄口不言，在漫长的时光里隐蔽、藏匿，以致遗忘。¹¹而《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所叙多属亲身耳闻目睹的经验，大都以事实为基础，确实为劫难的年代提供证言，一再收录选集也反映了写作修复记忆的功能。如果记忆被文学化，将被排除在外的过往放入一个有意义的叙事中，对文学而言，这或是亲历者的创伤心灵；或是跨世代的记忆传递。这些断层的苦难经验，呈现了现代国家建立之时的伤痕，也凸显作家和作品在某个历史阶段，与所处的时代之间的互动。所以历史朝向的未来，是将喑哑的事件转化为饱含意味的过去；文学的见证则是劫后余生的记忆重组，去迫近时光里的幽深暗影，重新召唤被国家权力遮蔽的曩昔，这是文学为历史做的事。

因此，两部选集在收录《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之时，不约而同强调了文学的历史功能。赵戎是以文证史，陈锺则是借文存史，两者都用以增补马来(西)亚的独立史，亦可见文学题材和风格随社会演变的痕迹。纪实文类确实是能与“历史”匹敌的书写类型，除了修正文献上的残阙疏舛，亦可用来质疑公众记忆(权力话语)，让教科书里三缄其口的事件，有机会重新进入文学的视野中，确立历史定位，这正是赵戎有意为之的“马华文学血的历史”。他首先是强调“墨写的撒谎不能掩盖血写的真实”。再者，他认为文化运动是政治运动的

¹⁰ 阎连科：《国家失记与文学记忆》《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与文学》，（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¹¹ 关于二战马来统治集团事迹，可参照依藤：《新贵人》、《光明何处？》《彼南劫灰录》，（槟城：钟灵中学出版，1957年），页53-56，187-190。另，李有成于“三年八个月：太平洋战争与马来西亚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创伤叙事与伤悼：重读依藤的《彼南劫灰录》》也以此书说明日据时期的集体创伤。亦可参考他的著作所提起的一个根本问题：国家何以要制造失记？见李有成：《失记》《失忆政治》，（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出版，2020年，9月），第18-25页。

开路先锋，马华文学运动则是文化运动的先兵，抗日救亡就是其中的具体表现。¹²他更是直言：“一篇成功作品，便是一支历史的火炬，它把某一阶段的历程照耀得如同白昼。”¹³换言之，赵戎相信文学有改换人们思想的行动效用，并可重现被刻意遗忘的“过去”，补叙历史的空白。所以，《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除了钩沉无法发声的事件，让文学担负历史被迫离席的责任之外，还彰显了赵戎一如既往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尤其1957年以后，以香港友联社为骨干的一批末代南来文人，引介自由主义文学，60、7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潮更是随着冷战局势席卷而来，在马华社会催生不同的文学声音。《学生周报》和《蕉风》杂志与友联以及美新处关系密切，在当时语境里，自然被视为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加诸1969年“513事件”之后，族群分裂、言论敏感、现实主义作家们多噤声封笔，创作气候萎靡。这是特殊年代的文艺生态，可见马华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受制于多角力的社会环境，以及因势利导的政治力量。赵戎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71）的选文，在非左即右的时代氛围里，在国家主体形成的冲突过程中，或带着较劲之意，也是不在场的在场。这意味着就算左翼系统已经彻底消音，但对马华文学的发展仍具有延展性的效应，可见文艺环境相互消长、抵触与流动的复杂面向。

陈锺特别收录《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则是马共书写大量涌现的九零年代之后。锺以为，马共书写以口述历史、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散文等纪实文类为主要书写形式，由众多“个人”生命史建构而成。这些文本都具有“重写历史”的强烈意图，但马共女性书写比例偏低且内容迥异于男性，所以锺怡雯以“微”历史（micro histories）的角度收录此文。她认为，马共书写面临一再重覆的写作模式，是一种“再现危机”（erisis of representation），彷彿书写最大的意义是笺注历史，填补空白而非展现自己的独特性。此文是当下的生命经验而非回顾之作，写下战争中人性和生活化的一面，所以事件有血肉；记述有情节，加上没有对抗主流历史的明确目标，不至于概念先行。锺出此言，意味着除却政治性功能之外，她亦看重薄物细故的表述，并认为女性拥有书写细节的能力，描述既个人化又具备故事性，因此能把历史缝补得更完整、更丰富。¹⁴然而，《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是否不流于概念化？在我看来，相对于同质性的马共男性书写而言，此文确实更重视个人情感，披露更多历史细节，但进步女性的生活，在抗日背景下出走、斗争，强调革命的理想化，并遵守着左

¹² 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1970年），第2-4页。

¹³ 赵戎：《一支历史的火炬——“火浪”底研究》《赵戎文艺批评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1975年），第3页。

¹⁴ 锺怡雯：《历史的反面与裂缝——马共书写及其问题研究》《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2月），第35-49页。

翼现实主义文学的路线，同样化约了文学的内涵。

南洋抗战以来，文学之创作、之为用，一直有着更直接更迫切的任务。1938年，郁达夫南下后主编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繁星》与星洲日报《文艺》周刊。1941年，胡愈之应聘来星主持南洋商报，两人在负责星洲救亡图存的文艺工作方面，都有志一同推崇“抛弃了象牙塔，幻想宫，而与政治军事，社会民众，合成一道的洪流”，光明的战斗精神。¹⁵相对于郁达夫的自由身，胡愈之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来加强抗日宣传阵地。因此，他开展的文化统战工作，其中一个任务，即是促成马华文学成为中共革命文学的一环。这当然有中国文左翼主导文学潮流的时代背景，1926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宣告新时代文学的要求，认为文学的内涵应当反映社会的意识型态，引起巨大回响。之后1930年鲁迅、冯雪峰诸人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了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这两件文学大事直接催生了南洋的“新兴文学”，加上抗日时期马华新文学呼吁“通俗化”，进而成立了“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强调反侵略和反封建的任务，深入民间。¹⁶后又创立“文艺通讯运动”，期望无产阶级文学得以赓续和发展，即保持革命文学的特色。¹⁷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更是文艺政策的奠基石，遏止了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西化的文艺传统。1945年国共爆发内战后，南来文人更是负起宣扬反蒋拥共、反美帝、反资本主义的任务，尤其胡愈之除了新南洋出版社，《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月刊之外，又创办了《南侨日报》，建立了一个连锁的左翼文化场域，对马华文学产生一定的作用。¹⁸由于早年殖民地阶级问题尖锐，华工处境艰难，战时日方又敌对华裔的残暴行为，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反侵略的世界观，自然深得人心；加上南来华人的情感流向，左翼文学能在马来亚土地上深耕有其必然的因素。直至1948年之后，左翼组织遭解散，左翼报刊被进一步查封，左翼人士遭拘捕或被令出境，战后蓬勃发展的马华左翼文学暂时消沈下来。¹⁹

《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即便倾向“微历史”的叙述特点，但行文充满政治意识的话语风格，比如：“战斗的意识超过了怜悯，一切只有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依归。”（页317）“组织的意见我们应该服从。”（页319）“我进一步认识了要求个人的出路，只有先争取大多数人的解放。”（页321）等等；²⁰内容上，为了对抗“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作者不可免地视创作为武装

¹⁵ 郁达夫：《几个问题》《晨星》（原载1939年1月21日）。

¹⁶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58-259页。

¹⁷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272-275页。引自 铁亢：《世纪风》（副刊）《总汇报》《文艺通讯写法》，（1939年11月6日）。

¹⁸ 可参考庄华兴《南洋大后方文艺及其遗留的问题》<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3/06/21/1-528/>。

¹⁹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²⁰ 所有惠斌《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引文，全出自锺怡雯陈大为编著：《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3》（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07年）。引文页码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数，不另外以脚注说明。

斗争的传声筒，正是表现了抗战和左翼文艺的特质与局限。大多左翼书写宣言太多，深度不足，缺乏文学经营的能力与见识，一直为人诟病。黄锦树就曾直言，马共作品内容严格限制在经验范围内，同时清楚界定可写与不可写的范畴，这种内在视野的局限，既是自我理解的局限，也限制了他人对他们的理解。²¹以左翼现实主义动机至上的文学观而言，写作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呈现政治思想的手段。就算无法以苛刻的美学标准回头要求，尽管此时它以再现时代的“见证”面貌重新示人；但叙事上，马共抗日的坚苦卓绝和壮烈牺牲，以群像代替个体，并挟带僵化的意识形态，“写作者的主体”已备受考验。

惠斌作为一个业余的写作者，生平不详，曾经参加过马共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战后在女性文化月刊《新妇女》发表几篇报导文章和抗战纪实散文。她没有专书，也不曾与马华文坛往来，马共基于安全考量经常更换名字，惠斌估计也是化名。锺怡雯认为，化名隐喻了马共的秘密身份，必须隐藏在官方的论述之下，成为马来西亚历史存而不论的一部份。²²但就创作而言，按照一般常规，作品会被赋予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作者、时代等背景讯息。读者也会试图从“作者”的内在精神去寻找作品的根源，预先假定有一个表现的特色，风格（style）及情感（sentiment）建构出创作的独特性，即艺术中的自我（self），来呈显与世界的关系。但是，面对着一个匿名或作者不详的作品，无法回答是谁写的，也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和原创性，只好把作者当作一个功能体来看待，转而强调作品有哪些存在模态？它从哪里来？如何流通？受谁控制？甚至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当不能去追问作者表达（expression）需要的时候，就只能去问：在什么条件和通过什么形式，作品呈现了什么概念或意义？²³

作为战时的叙事散文，惠斌恐怕不是想纪录历史，更不是想成为文学家。作品刊登在《新妇女》是一种策略模式，来建构或者推广左翼“新”女性的信念。她叙述了女性抗日的社会背景、打游击战的过程、在霹雳锡矿厂和胶林从事的秘密活动，以及二战结束后选择离家走上反殖的革命之途。字里行间总见概括性的政治宣言，反证了左翼文学观对于当时写作的制约。显然“作者”（author）只是语言构成的意识形态的耳目喉舌；“写者”（writer）占据发言位置，取而代

²¹ 黄锦树：《不在南方：论王啸平与贺巾晚年的小说》《香港文学》，第348期，2013年12月，第61-68页。

²² 锺怡雯《历史的反面与裂缝——马共书写及其问题研究》《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2月），第49页。

²³ 傅柯从四个面向谈论作者问题，第一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第二是作者和死亡的问题，第三是文本体系生产者，第四是社会系统生产者，从这四个方面论述：现代意义下作者何为？见 Foucault,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第205-222页。

之作者的主体地位。傅柯在《何谓作者?》一文中的基本论点,是从语言实践的角度,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创作主体”,看成是“语言的功能”的“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作者功能是透过一个复杂的运作而建立的,涉及到它所属的知识体系、历史因素和社会文化脉络。换言之,它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功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存在、流通,并获得认同且具有一定的地位。写作并非作者思想的阐释,而是话语运作的结果,因此,其身份不是自然身份,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也会因文化和历史时期不同而异,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发挥作用。人们不会在意话语到底是谁说的,而是关心这种话语以何种形式存在?它曾在哪里使用过?也就是“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站在作者背后的话语机制。²⁴

就傅柯的观点而言,作者不详的《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其作用是:如果文学可以做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那么它就可以被各种力量挪用。因此,即使惠斌书写一个新女性的抗日反殖经历,她是一个反抗者;但是在左翼的文学观里,她也是一个权力的受体。当时的报纸副刊,把写作当成传播机制,主张文艺即宣传,可见左翼文学是在建制化的语言里书写,且被政治领域的力量制约,为其拥戴的信念和政权保驾护航,其创作目的在于群体,不是个人。即是说,看似作者在创作,实则是外部某种看不见的话语在形塑或规范著作者,策略性地建构认同。所谓“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并不等同于具名的创作者,而是一套规训机制,决定某一文本能否被纳入体系、获得诠释、产生效果。在此脉络下,《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的“作者”之问题,即不再是指涉惠斌其人(或其是否真实存在),而是指涉一种运作:它如何被认可为文学,如何被定位为女性的见证,如何在左翼文化场域中作为历史补述的文本而被典律化。在此,惠斌的“化名”不仅是政治安全的遮蔽,而是此一转化机制,使我们得以从话语生产的角度,审视一篇作者不详的抗战散文,如何在历史与文学之名下被召唤。当独立创作的作者根本不存在,赵戎和陈锺两个选本着重的“见证”,也许就不纯然是作品和历史投射或重现的镜影关系。

记忆往往会重构历史,即是说,记忆不是映射,而只是在利益语境中发挥作用。²⁵旧事不见得是过去的事实(fact),在叙述的过程中,旧事会经过文本化而成为故事(story)。所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说,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作家选择什么样的叙事视角来“说出”他的故事,就可以分

²⁴ 同上。

²⁵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New York:Basic Books,1997)

辨出叙事不是历史事实，事实只是建构的解释。²⁶前人在特定的场域中讲述自己的历史叙事；后来者也可以通过解构，来指认其中的权力和认同。历史本身不是透明的，叙事会产生意义，但同时也会干扰事件本来的面目，尤其左翼文学经常渗透政治动机，可说与不可说会在矛盾中此消彼长。因此，实话实说的“见证”会因着立场的缘故，保留了某些事实，又放弃了某些事实。换言之，虽然赵戎和陈锺一再强调“见证”的用意，它确实也纪录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但文学见证的功能和价值，不在于真实性而是文学性。当书写只是纪实，读者的认识就只能跟字词一致，无法置换或诱发引申意义。但是，读者不是通过事实，而是通过作品中遗留的空缺、暧昧、不精确与模糊去进一步想象，才能感同身受未曾经历的事件。²⁷所以，若是历史想要在文学里借尸还魂，只能透过“再现”的美感效果，引发读者精神上的同情意识，而非把文学变成政治独白的转达形式。若文章只是政治话语的展演或正名，表示作者是以“文学的方式”在纪录或倡导理念，并非在创造文学，文学就只是一个意识型态所覆盖的封闭性系统。尤其减弱了文学的主体之后，又缺乏文学转化需要的时空间距，作者的“性格面貌”和“真实经验”，以及“事件沉淀”的复杂原貌皆无法发酵，只能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如此一来，没有亲历二战劫难的读者，没有目睹，没有身历其境，本来就难以感同身受，当迟到的他们与痛苦的经验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却没有被提供新的审美情境，不能“想象的在场”，因而无法回望和理解历史中的创伤，“见证”就失去了它的力道和意义。

叁、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回忆录记载，1937年马共成立“抗敌后援会”(Anti-Enemy Backing Up Society)，成员遍布马来亚各地。这是马共的一个外围组织，由此马共成员逐渐渗透进入学校、工厂和文化机构。²⁸这想必成功号召与收编了多数女性，《生命如河流——新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可为佐证。刊登《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的《新女性》则是号召女性抗日的左派杂志，皆可见三、四0年代的战争、革命、民族、国家，跟个人、性别话语交叠在一起。

《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里的女性，并非是革命队伍里的领导者，大部份是民运的人员，专门负责妇女工作，主要是对劳工和群众展开活动。里头

²⁶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文津，2005年。

²⁷ 潘怡帆：《见证，或文学的任务》《中国现代文学》，第39期，2021年6月，第17-18页。

²⁸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Published By Media Master, 2003), 第47-52页。

的女性“风”、“龄”、“莲”、“荣”、“阿娇”、“大姐”和“阿徐嫂”等都是化名，是谁不重要，那是地下的秘密组织，更重要的是人物和情节皆表现了左翼的信仰。文章叙述抗日生活的危难与艰辛，然而，无论是书写心理恐慌或身体暴力，最后都是光明的喊话——向内，肯定政治受难者的奉献牺牲；向外，则表现其思想的社会意义，加强了左翼精神的重要性。如此一来，个别的受难者由“我”变成了“我们”：“面对着凶残的暴乱，广大的人民都在遭殃受苦，我们也别把自己的家看得太重了，以后长年久月的战斗生活，很容易把个人私事忘掉的。”（页302）“今后就让战斗来洗涤我的私情，用我即使微小，然而，尽了自己战斗的工作的力量所创造的人类的幸福，来报偿已我辜负了热爱的双亲和熟人的关心。”（页302）“莲同志，妳去了，你永远不回来了。然而你的影子永远烙印在大众光荣的回忆里。”（页327）“死，在这激荡的年代，是很平常的，四颗柔弱的女性的心，变得坚硬了，冲吧！”（页331）可见个人的舍生超越了肉体，升华到全体尊奉的价值。从文本上看来，置身于战争中的“革命”与“性别”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激活了女性从未展现的自立和刚毅，在口号式的呼喊中，洋溢着激情。以阿徐嫂为例，她当童养媳任劳任怨，被家暴，在工作中加入矿工会和抗盟会，“进一步认识了要求个人的出路，只能争取大多数人的解放”（页321）。她们的前途与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正代表那个时代的共识（或盲区）。对于她们来说，抗战与其说是反法西斯反侵略反殖民的爱国情怀，不如说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而《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刊登在左翼立场的《新妇女》杂志，更是意味着惠斌的故事，展现在同样的诠释群体里。早年沈兹九创办了亲共抗日的《妇女生活》，号召女性参与国家救亡运动；《新妇女》成立于1946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在《纪念“三八”节》一文中，她强调只有女性觉醒，“只有民主自由，妇女才够谈得上解放”。²⁹显而易见，当时马华女性问题是旗帜鲜明的政治运动问题。因此，作者站在怎样的位置，叙事就有其方向性（directedness），书写内容召唤相应的行动意图（intentional），强化某种集体力量。

一、她的故事（herstory）

锺怡雯认为《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是“女性的”，“非官方的”的另一种历史。看来确实如此，作者主要书写女性的抗战经验，强调了女性意识启蒙与女性情谊，尤其女性被动地卷入了战争，女性的声音应当也是历史的“见证”

²⁹ 沈兹九，《纪念“三八”节》，《新妇女》1，1946年3月，第8页。

之一。传统女性一生从父，从夫，从子的从属位置，中下阶层的女性生活上必然受到局限；但就算幸运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也不见得和男性拥有相同的条件。在父权社会中被家务劳动剥削的女性，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进行精神层面的“创作”，间中还尚未考虑男性文人主导的文艺资源和发表管道是否公平的问题。不管是赵戎还是方修的《马华文学大系》几乎不见女性作品，即便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收录了一个女作家莹姿的作品，却在导论中略过她只字不提。甚至马共斗争全然结束之后，九零年代以后男同志在书写回忆录的时候，女同志仍因为教育程度的限制和繁忙的家事成了“躲在暗处的埋名者”，理所当然地消失在父的历史中。

因此，对于父权压制下的女性来说，“书写”本身往往带着性别的印记，具有抵抗的作用。尤其五四之后，二三零年代思考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定位，并于文学创作中铸造新式女性角色，要求女性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形象，应该是一股潜流。从反抗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到进一步抵抗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剥削，女性解放与战争时局，以及政治革命捆绑在一起，与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重叠。《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中，惠斌出入农村教导劳动女性读书识字就是一种“自我”的争取。文中的“大姐”“本来是不识字的，经过几年不断努力学习，斗争锻炼，终于负担了重要的工作”（页312）；还有自小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种种束缚和虐待，渴望进步与解放的“阿徐嫂”就说了：“同志！请教我读书，我要学习”（页322）；几位年轻的农村干事，“更是迫切地要求读书识字和学唱歌”（页305），表现出女性现实和性别的困境，以及提升自我的积极性。这种由女性发声的“自我”，具有正面的政治性。整篇抗日散文几乎没有男性身影，即使有也是一晃而过。惠斌站在女性本位出发的战争纪录，当然具有文献资料外更珍贵的性别意义。虽然惠斌的写作主要依据过去的回忆和经历，然而任何“记忆的选取”其实都代表了潜在的意识形态。想要做有意义事情的“风”、家境良好有上进思想的“龄”、不想穿纱笼，吃槟榔，做典型娘惹的“莲”、多病却很积极工作的“荣”、来自富裕家庭却不愿麻木不仁的“阿娇”、激昂充满斗志的“大姐”和被家暴要求个人出路的“阿徐嫂”等。每一个女性，她们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内心认同的政治信念，对抗那个时代所能容忍的限度，就是为了自由而斗争。因此，即是本尊重现，也是惠斌有意透过创作，塑造出来的“解放自己并想解放人类的新女性”，“诠释”和“正当化”了女性的地位。

同一时期，方修于1971年编选《马华新文学大系》，也许笼罩在冷战的“寒蝉效应”之中，没有收录这篇作品。若与《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收录的莹姿的作品来对比的话，同样写抗日情操，同样写女性情谊，但因39年日尚

未侵马，战争还没对生活造成影响，生心理等各层面的感受不同，在文学里尚未出现顽强的抗战意志，以及左翼文学特有的阶级意识。《我的芳邻》写一个落魄的舞女仍出一己之力卖票救“国”。作者描写舞女的生计艰难，受到生活和情感的折磨，物质与精神的压迫。叙述者虽流露关心：“觉得她实在可怜，身上的丝绸衣锦等于是铁锁铜链”，却没援手改变现状。舞女本身也没有在委屈中强力控诉，只有心酸无奈：“舞票是从老板手里卖的，一张票我们只抽十分之二罢了。”同时也可看出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被突显了某种内涵：“什么鬼来他买了舞票就要跟他跳，红毛鬼也好，大头鬼也好，有些大头鬼脏得要命，可是他买了票，你就不能不起身。”资方淫媒的多方剥削，也不过强化她只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通过女性反映社会和国家面貌。另一篇《走路的故事》是一个隐喻，用走路来譬喻中国抗战的动态，虽然妇女们都嚷着抗战要走到前线去，但这一条路却是崎岖黑暗并且空前的，有人勇敢有人怯懦有人裹足不前。“路没有光真的不能走，黑暗中摸索就是大马路上也会跌的。”³⁰虽然在内容上两人同样积极金援前线，齐心救“国”，但显然地，和惠斌相比，莹姿作品的抒发意义大于启蒙意义，有“抒情且无用的 (iyrical, useless)”“女孩子气”之嫌，缺乏女性的能动性，女性就只得接受父权既有的定义，臣服于男性的一个“他者”。惠斌则将女性受到父权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的剥削结合在书写中，并且强力反抗之。如阿徐嫂说：“以前我恨命苦，活受罪，但现在我已经明白这不是命运，而是社会不好。”“组织把我调来这里，叫我努力工作，前途一定很有希望。”（页 321）文中的女性多是来自农业社会中的贫穷家庭或工人阶级，她们的个性里有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坚毅等特质，在革命话语里觉醒；即便来自中产阶级，娇弱体质的莲也愿意自我改造，向下层群体靠拢，展现更强的韧力。文字书写上更是充满了美好的情操，浩荡的正气，奋斗的精神，可见惠斌是有性别意识的构筑理想形象，“书写”的意义，对她们而言，不单是为个人而是为所有的女性。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女性的感受却变得极为平面，虽然她们能够走出家庭参与抗战，展现“新”女性面貌，但新的规范消弭了根本的性别差异，典型的女性形象成为意识形态叙述中的一个特定编码。

³⁰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71年4月第一版），第427、320-321页。

二、仍是他的故事 (history)

身为马共女性的一份子, 中国共产党呼喊的阶级解放就是妇女解放, 无疑是女性的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从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到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社会变革措施, 确保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这对于马新一带的弱势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 参照《生命如河流—新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一书即可知, 她们扬弃家庭强加女性的重担, 跨出性别的社会制约, 想着翻转自己的命运, 相信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国家兴亡是共同体。其实, 贫困和暴力才是马来亚女性困境的主要成因, 其严重性和迫切性超越性别问题, 她们因而认为自己的悲惨遭遇、痛苦, 无助和绝望都来自暗无天日的社会, 只要社会好了, 她们就好了, 而根本无法思考阶级话语, 已经抹杀了可以建构的性别意识 (gender erasure) ——男女都一样的表述, 男女平等的实现, 否定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然而, 对于当时身处底层的女性来说, 这样迂回的思维方式超过了她们的需求, 也超过了她们的理解。《新妇女》和《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 强调的仍是最基础最本质的——女性要为自己发声。知识阶级女性能够争取更多发言空间, 而边缘的女性如何说? 说什么? 也非常重要。

阿徐嫂一再被家暴后说出她的翻身远景: “那死佬把我打伤之后, 我一时不能出来工作, 但不像以前一样一味屈服。我在工厂认识了很多工友, 大家很要好, 他们又很同情我的痛苦, 鼓励我安慰我, 并介绍我参加矿工会。日本来了我就去做山工, 不久我也加入抗盟会。于是我进一步认识了要求个人的出路, 只有先争取大多数人的解放。” (页321) 《生命如河流》里, 黄雪英说: “日本侵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已经十几岁。爸爸死的时候, 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日本兵占女孩子的便宜, 他们的行为有如禽兽。我参加共产党的活动, 他们开办学校教育我们, 又带我们出去玩, 还读党的报纸给我们听。当时我一个字也不会, 他们教我们说妇女是最受压迫的阶级, 他们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参加游击队是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我知道要将来有好日子过, 只有走上这条路。”³¹ 书中不乏相关例子:

“我们当然知道参加马共是很危险的事。但是我们那么穷, 他们又肯帮忙, 我们被他们的和善打动了。那时候, 我完全没想到会加入游击队, 是后来泰国政府开始到处抓人时, 为了保命才上山的。”³² “解放军在我们住的泰马边界很活跃, 他们常常组织民众跳舞、开会、搞青年团等等。他们也会带食物给我们吃, 我们

³¹ 邱依虹编: 《生命如河流—新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2006 年), 第 195 页。

³² 同上, 第 4 页。

很穷，所以被他们的好意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孩子们那时候连饭都没得吃。共产党的活动很吸引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很喜欢唱歌和跳舞。”³³“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只有14岁。我没有上过学，弟妹又很多。那时爸爸已经死了，只有阿母一个人撑起整个家。日本投降的时候，几个以马来人为主的进步和革命的组织，都在村子里出现了，形成一个很强的联盟。我们学到了共产党是好的。他们为信仰、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虽然不是很了解，我还是撇下九个月大的第二个孩子走了。”³⁴由此可见，女性在社会上农工阶层的处境，促成其认同、投身组织的需求与迫切性。草根阶层的她们，并非受到意识形态感召而加入马共，而是迫于生计艰难，在底层挣扎度日的结果。她们参与后获得教育的过程中，才提升了自我认知，如林观英说：“做为妇女，我们更要参加革命，我们要为解放妇女而斗争。我们那时代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封建制度非常压迫妇女，社会和家庭都对妇女有很大压力，妇女常被看轻。”³⁵进而感受到身为女性的独立与自主，产生了力量和信心，才认同这场革命的精神，希望生活在一个平等，没有阶级的社会。可见在政治叙事中，虽然女性被压迫，但并非定义于受害者的位置，反而是为了强调一个意识醒觉的过程，也强化了文章的主题：弱势者的遭遇强而有力地印证了现实的不合理，而后反抗之，与革命和国族言辞结合。女性的出路完全依赖“党”的救赎，在女性尚未确立、诠释自己之前，她已经先服膺了“党”的话语。

因此，无论是《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还是其他马共女性文本，不管说什么，想法和口吻都大同小异，都是女战士单一的观点。惠斌笔下，有一个特别彪悍的女性——大姐。大姐就是领导星洲建筑工友进行斗争的江雁女士。她原本目不识丁，自学后担负重责，还成了女战士。1940年五一劳动节，她在几万工友面前的激烈演讲，声名大噪。《阿焰同志回忆录》里，同样提到了江渊大姐，说她是工运中响当当的人物，曾在几万人大会站在讲台，演讲有煽动力，抗日时参加游击队被捕死刑。³⁶对于大姐之死，惠斌是这样写：“为了揭露敌人的造谣中伤，提高抗日组织的威信，当晚自缢而死……对于一个战友的牺牲，自然是无限痛惜。然而她死得壮烈，死得伟大。”“这次的死，更是表现了她坚贞的本色。”“而未死者的一代，踏着死者的血迹，记取死者的英烈，去迎接黎明的曙光。”（页311—312）阿焰则记录下她的遗书：“亲爱的姊妹们，这是我和妳

³³ 同上，第71页。

³⁴ 同上，第224-225页。

³⁵ 邱依虹编：《生命如河流——新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6年），第28页。

³⁶ 阿焰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走上抗日的道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焰同志回忆录》（吉隆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6月），第29-30页。

们最后一次谈话。现在我已准备牺牲，绝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死后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平常对你们说的话和教你们做的事，你们要继续为民族，为妇女解放而奋斗。”³⁷文章中彰显了一个宁死也不投降的“女英雄”形象，强调英勇牺牲的精神，以身殉伟大无私的信念，来凝聚群体共感。她的刚阳特质，以及抗战的“激情”，不正与男性建构的国家民族主义叙事如出一辙？战争和革命的作用，虽然被呈现为女性解放的力量，惠斌和其他作者，亦是站在女性立场来发出集体声音，但显然地，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动员女性抗战时，由男性政治家指导，在男性主体的民族文化里，女性解放只是重要的途径和手段，成为面对共同敌人联合战线的对象，始终处于国族论述的服从者的位置。

除了“花木兰”的故事，多数女性在战争中不是缺席，就是被保护者，或者是阻碍者。一如文中从事娼妓的女奸细被抗日份子围捕了，群众们激愤下处死她们说：“战斗的意志超过了怜悯，一切只有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依归。”（页 317）日本战败后惠斌返家探视双亲，也不久留：“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拒绝小我家庭幸福的诱惑”（页 337），“即使我是微小的，然而尽了我自己战斗的工作的力量所创造的人类的幸福”（页 338）。惠斌经由行动和文字实践，抗拒扮演传统承欢膝下的女儿角色，决心实现自己和国家未来。所以，不管是惠斌之文还是其他马共女性的文本，都不乏如此类标语式的表述。在性别意义上，“女性”的符号，承载了战争和革命的宏伟叙事，阶级差异取代了性别差异，更遑论性别化的写作。女性高呼着女性解放，实则是无性别的状态，很难自立于国家机器之外。换言之，在父权与民族主义交融的机制下，为了对抗权力不均的政治结构，只好着眼于民族命运与生存处境。这些苦难修辞将国家 / 民族凌驾于性别之上，阶级解放就是妇女解放。然而女性依然没有摆脱被宰制的命运，她们都拥有一个非肉身的父亲一党，党的声音往往取代了女性真实的声音。因此，在文学上，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娜拉的出走，走到了丛林里，成了一个共产党游击队员。一个被共产党所救的女性，成了一个劳苦大众的故事，而且是千千万万娜拉成长的模式——一个贫困，于生活中受难的女性，在党的栽培和指导下，成了解放妇女解放全世界人类幸福的女战士。这一段女性生命史转化为策略性的政治修辞，女性的表述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在戴锦华的论述中，这意味着“女性”符号在历史与话语体系中不断被赋予意义，却从未真正拥有自身语言的位置，成为被国族、

³⁷ 同上。

政治、阶级所挪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虽被看见，却未能发声；被命名，却无法自我命名。³⁸

在《生命如河流》的后记里，采访者谈及采访过程说：“她们所说的话是会被录起来的。有时，当她们谈及一些较敏感的话题时，也会叫我把录音机关掉。”³⁹在大部分的访谈里，除了女战士叙事的架构以外，受访者至死不渝崇敬左翼思想。在自我认同上，她们的动机明确，出于自觉和自愿，没有一位受访者表露出怀疑或追悔等复杂情感，或控诉被迫参与、有不谐之音，完全听不到越界、不满与反思。她们不约而同表现出社会的责任感，乃至本身的理想，极欲正当化自己的目的和付出，进而正当化马共组织的斗争，尤其妇女解放至人类解放的信念，使受访者的政治信仰更为坚定。因此，当惠斌的《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作为一篇纪实的文学作品，以“见证”历史，重新收录在文学选集的时候，除了文字更为修饰和流畅之外，内容和其他回忆录或访谈大同小异，穿行在抗日 / 抗英 / 抗马的脉络中都游刃有余。当然，它们的差异，在于书写之时并非已经拉开时空距离，而是立即回应当下；相似之处仍在于，性别修辞在意义结构中，焦点仍然摆在为理想的牺牲与奉献。惠斌和文中的女性们为抗日，为革命为解放女性和人类，承担某种不得已的代价，即便身心受创，朝不保夕，仍然强调追随信仰的荣光取代创伤的悲情，只见性别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重合，却无视两者的分歧与冲突。因此，录音机关掉的敏感话题，也许正是马共可说与不可说的清楚界定。这些女性面对创伤记忆之时，究竟“选择”或者“遗忘”了哪些必须过滤的细节？而去符合/重建“我方”的历史？她们是否意识到个人的记忆，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之时，也可能是幽暗的心灵图像？或者也是重新的自我认知？一如惠斌的《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她们的言说一方面作为时代见证，以正名/证明马共抗日的功绩勋劳；另一方面，她们致力的解放运动，让女性挣脱父权的枷锁之时，却让自己的精神性别失落在历史的视域之外。

肆、结论

³⁸ “空洞的能指”是指表面上看起来代表某个明确意义、实则内部空无、具有高度象征性但无实质内涵的词语。参见戴锦华：《“女人”的故事：一段剧变中的历史》《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 2006 年），第 47-50 页。

³⁹ 邱依虹编：《生命如河流—新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6 年），第 346 页。

相隔三十年，《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一文因着时代风向重见天日，打捞了沈没（沈默）许久的集体记忆。可见需要寻找历史真相时，文学本身就是证言。此文在长达数十年之后出土，除了彰显历史事实之外，也侧漏了华族的集体创伤。当时，南来文人在马创建出版社、办报等宣扬反殖、反资本主义的任务，建立了一个连锁的左翼文化场域。这篇文章发表于号召妇女抗日救亡的《新妇女》，正如傅柯所言，不需追问“谁写了这篇作品？”而应追问：“这篇作品如何在左翼的语言体制中被允许发声？它如何被选入《新妇女》，又如何因其“女性/抗日”身份而进入文学选本，进而获得“见证”之名？”显然惠斌这位“作者”不是某个独立主体，只是左翼革命话语在战后语境中的能指，用来召唤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是一套话语结构下的功能产物。当事件被记录下来，被编入文学选集，可作为实录来修正文献上的残缺疏舛或补之不足。显然地，赵戎与陈锺收录此文的基本动机，是将民间的“真实故事”成为“官方历史”；文学于此是裨补史阙的功效，用以服务想进入文化记忆的叙事。然而，若历史想要在文学里翻然复生，途径不是事实而是想象。否则，“文学”会处于一个吊诡的情境，创伤的记忆在马共激进的运筹、左翼叙事的教条化书写里，“见证”变得漂浮与游离。

同时，在苦难的历史经验里，一般是男性中心建构的抵抗记忆；女性多以悲惨命运作为民族叙事中被压迫的隐喻。女性们二战时期受到政治感召，介入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风潮影响所致，也是女性尝试在具体的实践中改变自己的位置。因此，《我如何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的用意是为了号召女性投身抗日，也为了推广左翼“新”女性的信念。陈锺收录此文，在于马华文学里极其罕见女性抗战的主题，男性的宏图大业里终于见着女性的身影。这些作品确实把弱势群体与宏大目标连接在一起，字里行间带着昂扬的豪情，彷彿是文学里的一个突破，却同时也成了一种限制——文本确实呈现了“性别”同步于社会、政治与战争，却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让经过修正的，强而有力的父权（党派）意识形态取代之。女性在革命和战争中的身份和感受，复杂的意识变迁，以及此一过程中承受的痛苦、牺牲和代价，皆一一被消音，并没有纪录在过去，也就无法超越时空来到现在，只余下书写的困境矛盾地成了时代的见证之一。

参考文献

阿焰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走上抗日的道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焰同志回忆录》（吉隆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6月）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Published By Media Master, 2003)

戴锦华：《“女人”的故事：一段剧变中的历史》，《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5年）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4月第一版）

Foucault,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 1984*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郁达夫：《几个问题》，《晨星》（原载1939年1月21日）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着，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文津，2005年）

黄锦树：《不在南方：论王啸平与贺巾晚年的小说》，《香港文学》，第348期，2013年12月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李有成：《创伤叙事与伤悼：重读依藤的《彼南劫灰录》》，《“三年八个月：太平洋战争与马来西亚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16年）

李有成：《失记》，《失忆政治》（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20年）

潘怡帆：《见证，或文学的任务》，《中国现代文学》，第39期，2021年6月

普洛普：《故事型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沈兹九：《纪念“三八”节》，《新妇女》1，1946年3月

施慧敏，“见证”的文本：《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的脉络化解读

邱依虹编：《生命如河流—新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6 年）

依藤：《彼南劫灰录》（檳城：钟灵中学出版，1957 年）

阎连科：《国家失记与文学记忆》，《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与文学》（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0 年）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散文（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年）

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 年）

赵戎：《一支历史的火炬——“火浪”底研究》，《赵戎文艺批评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 年）

锺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 - 2003》（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07 年）

锺怡雯：《历史的反面与裂缝——马共书写及其问题研究》，《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9 年 2 月），页 35 - 49。

庄华兴：《南洋大后方文艺及其遗留的问题》，<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3/06/21/1-528/>